

第一章 古老大地的新时代

古老的东方大地曾孕育了辉煌的文明，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种辉煌已显得十分遥远。19 世纪下半叶，被人称为睡狮的中国被西方的枪炮和文化惊醒了，他想方设法努力恢复自己昔日的威风，经过几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巨大的中国船不断追赶着航线前方的船队。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城的枪声唤起了中国人又一次的迈进，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充满希望与坎坷的转型时期。

一、了不起的丰碑

1912 年元旦下午 17 时，孙中山由上海乘车到达南京车站，一时间军乐齐奏，欢呼声震天，长江上的军舰鸣礼炮 21 响。这一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是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的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封建帝制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当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垂暮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蓬勃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第一次较大规模冲击中

国封闭的大门，也是中西两种政治制度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其结果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此后的几次中外战争，均以“天朝上国”的失败而告终，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其生存已受到威胁，不少中国人的心理由自尊自大转变为自卑，民族整体的自信心很长时间不能建立起来。但是，在接受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挑战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重新振兴华夏的道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到洋务派练兵设厂求强求富的努力；从维新思潮、戊戌变法的政治尝试及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到 19 世纪 90 年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创建共和国的努力，终以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辛亥风云终于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创建了共和国。在 70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几经曲折，几经努力，终于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结束了束缚中国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引进了西方的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一座了不起的丰碑。

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改造中国的设想。孙中山立志“亟拯斯民于水火”，是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典范的。他指出：“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①。1894 年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政纲和 1895 年在香港兴中会的会员入会誓词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897 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提出建立民主政体的主张。当时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60、563 页

他提出要推翻清政府 建立“良好政府”这“良好政府”是指“合众政府”或民主立宪政体而言。同年他告诉宫崎寅藏说“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①。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以“建立民国”为革命三大宗旨之一，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②。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设计了具体的民国形式，提出“五权分立”的主张，分行政、议政、审判、考试、监察五权，以弥补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不完备，希望中国的民主制度能学习西方制度之长而弥补西方制度之短。与此同时，革命派的邹容、章炳麟等人也就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做了论述。不过，由于当时形势的特点，孙中山及革命派以宣传反清和建立民国的武装起义实践为主要任务，对未来政体的设计还只是粗线条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实行着封建专制制度，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皇帝视“国”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民”作为自己的奴仆。历史上数百次农民大起义要推翻这种吃人的封建社会，但不是被血腥镇压，就是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辛亥革命造就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变革。民国的建立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历史，此后，谁想做皇帝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就会受到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舆论和各阶层的反对，民主共和观念开始在广大中国人心中占有地位，民众中的皇权观念已发生根本动摇。尽管民国历史的发展充满坎坷，不尽如人意，但许多人仍认为应坚持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改革，逐步将民国政治经济纳入正式轨道发展，改革那些被旧势力旧习惯影响的政治行为，从而反对恢复封建专制制度，这也是民初两次封建复辟草草收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民国的建立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使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受到挫折。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封建政权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基础。民国建立后，新的政治体制支持发展民族经济，加上舆论自由，为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广泛和深入，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受到人民日益自觉和日益壮大的抵抗。同时，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对亚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

中华民国的建立功绩还在于开创了新的政治格局。尽管有许多挫折和倒退，但它毕竟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过渡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孕育着促进民族振兴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从黑暗中国向光明中国迈进的一个不可少的历史阶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8页。

二、新政体的魅力

中国实行了共和制，人们的评价和预感不同。拥护共和为共和奋斗的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腾飞指日可待；反对共和的人觉得大祸临头，中国将走向灾难。还有许多人仍麻木地对待这一切变化，消极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中国和世界都在观看共和以后中国如何发展，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顿时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南京临时政府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表示拥护共和的旧官僚联合组成的，临时政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法，使基本是留学外国、年轻有为的同盟会员任各部次长，临时参议院也是革命派占有优势，南京临时政府的实权实际掌握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

新政体、新政权采取什么政策颇为世人所关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特别在《临时约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中国与封建专制政体决裂。

在政治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蛋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经济上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的人身、家产受到保护，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为保护人民权利，以示与封建官僚机构的不同，南京临时政府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整顿警

察队伍和治安秩序，整顿吏治，宣布对利用职权欺压良民、贪财中饱，违背共和宗旨的官吏要依法严惩，并号召人民揭发检举，人民可直接到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府控告。2月3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原有一切私产仍归个人享有；没收清朝官产归为国有；对清官僚的财产视其对民国的态度决定是归还还是没收。临时政府还宣布一些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政策，革除“大人老爷”的称呼；剪除象征清朝顺民的辫子，提倡男女平等，禁止束缚妇女的象征——缠足，严禁蓄娼；临时政府还明令严禁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严禁赌博等。

军事方面，针对当时各地军队分散和纪律涣散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整编陆军、海军，整顿南京卫戍区。南京卫戍区和陆军部发布通告和军律，规定凡有抢、窃、焚杀良民、强奸妇女者一律枪决，纵酒行凶等要受处罚等12条军纪。通令各地军队不许私自筹饷，以杜绝一些军队以筹饷为名招摇撞骗掠夺钱财之恶行。针对一些军队只求数量，不求精练的状况，命令各部队停止招兵，注重军事训练，准备全力北伐。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工商制度，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2月5日，临时政府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并指出：“实业为国民将来生命脉。”实业部还通知各地保护商业，加强贸易。在临时政府经济政策的号召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下，许多人对兴办实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实业协会、工业建设会、各种垦植会等团体纷纷成立。实业界人士兴奋地表示：“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也。”工业建设会表示要“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要集各种专家和技术人员，推动工业发展。各地出现了一个开矿办厂、修铁路，争办实业的高潮。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也提出不少进步措施，如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废止读经等。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规定将以前的各种学堂均改为学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宗旨”，学校教员看到教科书中不合共和精神者，可自行修改，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①。有的省教育厅还发布通告，如再有让学生读“四书”“五经”者，一经查出严加惩戒。与此同时，教育部还批准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蒙回藏师范学校，推动新式教育的全面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颁布了大量的革命政策，反映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他们为造就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朝气蓬勃精神。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有许多的不足，也由于其自身势力的不成熟、不强大和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临时政府的这些政策最终是纸上谈兵，实效不大。但是，这一新生政权以全新的面貌的亮相，是辛亥革命否定了旧的政治体制之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

^①《东方杂志》1911年8卷第10号。

领域向传统挑战的有力一举，同时也激励了要使中国走上强国路的一批人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它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向新时代的转换过程，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新式政权将她的全新面貌，展示在古老而千疮百孔的神州大地上，充满了魅力。

三、凯歌声中的危机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许多骨干是在国外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国内有着各种联系，但毕竟对国内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和熟悉。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推翻封建专制大功告成，急于想建设新的中国。一些人急忙“功成身退”，对于民国建成后仍要走复杂曲折的路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低估了旧势力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的风云变幻，造成了一批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于在变化的政治风波中自我保护和钻营发展的人。在清政权统治摇摇欲坠的最后几年，他们在观察政治风云，寻求新的生路。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屡仆屡起，最终使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清政权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时，曾表示要对清廷忠心耿耿，“决不辜负孤儿寡母”（指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在掌握军政大权后，对革命党人又拉又打。他指使北洋军攻陷汉阳即按兵不动，迫使革命阵营正视他的军事实力；同时使列强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局面、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在列强的干涉下，南北进行了议和谈判。在列强、袁世凯及革命

阵营内部立宪派、旧官僚等人的压力下，终于使孙中山等人做出承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了这一保证，于 1 月 16 日朝见听政的隆裕太后，他跪在太后面前，满面泪痕、哽哽咽咽地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北洋六镇已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一句话，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1 月 26 日，袁世凯的亲信、部下段祺瑞等 46 名北洋将领突然从前线发来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①。2 月 5 日，段祺瑞等人又发了一封致内阁请代奏电，指出“共和政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因而，他要“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②。在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和袁世凯内部逼宫的压力下，走投无路的宣统皇帝只得于 2 月 12 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

迫使清帝退位的直接动因是袁世凯的逼宫。但袁并非转向革命而倾心共和，而是因中华民国有一大总统的位置给他。在晚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袁世凯并不是头脑顽固、僵化的人，他在任军政要职过程中，如主持小站练兵和在天津主持军政时期，都从西方学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使军队的近代化和城市的近代化迈出有益的一步。不过，他仍属于封建官僚，仅对自己仕途感兴趣，这从他在 1898 年出卖维新派的举动中可

《辛亥革命》第 8 册，第 174 页。

《辛亥革命》第 8 册，第 178~179 页。

以清楚地了解到。1912年，归国任职的顾维钧与袁世凯进行了一次谈话，袁问顾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共和国，以及共和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在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①。

中国实现了共和制，远不意味着与传统一刀两段，对共和并不了解的袁世凯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些经验使他在对革命党人的斗争中游刃有余，几乎步步得胜，如愿以偿。他在清末民初政治格局中的崛起，使新生的民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逼宫得手后，2月13日袁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间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并呼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缺乏对中国官场了解和政治斗争实践的孙中山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蒙骗，2月14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指出，“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以为“从此帝制永不留中国，民国目的，业已达到”，他还指出，“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②。当天临时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2月15日召开临时总统选举会，袁世凯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93页。

^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4、185页。

统，袁世凯实现了其政治目的的第一步。

孙中山辞职时，曾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等条件，作为保证民主制度和防止袁世凯独裁专权的措施。袁世凯并不在乎这几个条件，满口答应，略施小计便使这些措施失效。迎袁专使蔡元培去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表面要南下，背地指使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制造兵变事件，造成北方政局混乱、袁不能离开北京的假象。迎袁专使信以为真，南京只好让步，最终决定建都北京，这样袁仍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革命派势力不能牵制他。3月10日，袁在北京就职，不久便组成唐绍仪内阁，政权实权掌握在袁的党羽手中，革命党人仅是陪衬而已。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自己统治基础还未完全稳定，革命派的声势仍较大，并控制着南方数省和参议院的多数，国内民主潮流亦在高潮，正如梁启超所分析的：袁世凯“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① 所以此时他以稳定自己统治为主，仍高唱维护共和、遵守《约法》的高调，在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中信誓旦旦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主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②。南北势力在表面上和平共处，而袁世凯暗地准备大权独揽；革命派渐渐松懈了警惕，以为民国已经走上正轨，中国在共和成功的凯歌声中，实际已经危机四伏。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68页。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第29页

1912年8月和9月，受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先后入京与袁“共商国事”，袁对二位革命元勋的到京进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北京前门车站前用鲜花彩绸结成绚丽多姿的欢迎坊，总结专用的金漆朱轮白马的马车迎接，在多次欢宴和13次与孙中山亲切会晤中，袁对孙中山的主张一概赞成，孙说中国以农立国应实行“耕者有其田”袁表示“事所当然”孙中山表示要建设铁路以促使中国实现民主主义，袁就授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①。袁世凯伪善的表演，完全欺骗了孙、黄。孙中山兴奋地表示，10年内不进入政界，支持袁世凯当10年总统，让他练兵百万，黄兴更是表示要解散南方军队，甚至要求袁世凯加入国民党。革命派领袖被袁世凯的表演所迷惑，对其欲行独裁统治和背叛共和没有应变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国民党是于1912年8月由同盟会和几个政团共同组建的，宋教仁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致力于议会斗争。国民党在1912年冬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取得参众两院多数。但是袁世凯不容自己独裁道路上出现阻碍力量。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身死。宋案调查结果显示，直接布置暗杀的是袁世凯的心腹、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本人。真相大白于天下后，早有准备的袁世凯要以军事手段消除革命党人的力量，而缺乏准备的革命党人内部纷争，举棋不定。南方各省虽仓促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在军事对抗中很快处于下风，最终失败。共和的

^① 《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122~124页

危机公开化了。

袁世凯在消除了革命党人的军事对抗后，加紧独裁统治的步伐，他先收买议员，使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炮制袁记宪法，当上终身总统，最终又要黄袍加身，当洪宪皇帝。袁世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当他欲黄袍加身时，受到了革命党、广大中国人民、其他派系军阀及北洋军阀内部各方面的反对和抵制，终于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革命派势力一度有所恢复，但在各派军阀轮流控制中央政权的情况下，中国尽管一直维持共和国的虚名，而各方面都不能走上正轨，出现了纷争、动荡的局面，西方引进的政治制度在中国运行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不正常状况，人们看到的共和国是一畸形、滑稽的仿制品，与引进西方政体者的当初预想相去万里。

第二章 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畸变

辛亥革命使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度。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移植试验未获成功，其基本原则在中国都受到了破坏，中国的共和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畸形变态的“共和国”，与革命党人的当初设想相距十分遥远。

一、政党政治的误区

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重要保证，它以民意为导向，以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为基本形式。民初的政党政治未能进入正常运转的轨道。

1. 围绕政党政治的论争

政党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 19 世纪的英国，逐渐传入欧美各国，英、美、法、德、日等国的两党或多党制度，成为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政党知识来源及仿效对象，许多人努力将政党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不过介绍者由于各种局限，未能详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及发展过程，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也忽视中国接受政党制度所应具备的条件，因而在政党政治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较混乱的局面。

民国建立后，为适应按西方的模式建设新的国家之需要，为了在共和制度下争取对政权的控制，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及众多的政客纷纷组党结社。民初政党一时大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也有很大关系，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以政党作为自己争夺权力的途径，以代替过去的科举仕途，使政党热在民初加温。于是，民初几年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组党热潮，“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初期政党林立时代”^①。不过，其中有许多党、团并无明确的政纲和完善的组织，很快便自生自灭。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随着南北统一，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政党开始进行纷乱的改组、组合，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政党林立现象逐渐消失，最后形成了两大势力——国民党和进步党。

民初围绕着政党政治兴起引起过激烈的论争。黄远庸评论道：“今者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既尽驱率入于此围幕之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又有一群矫异自好或无意识之徒，以超然为美名，以党为大恶，相戒以勿争党见为爱国。党人之视己党，则神圣之，其互相视，则仇雠之；无党人之视党也，则蠹贼之。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目有视视党，耳有闻闻党，手有指指党。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政评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

^①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11~12页

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①。

民国初年，许多人对政党缺乏了解，只认为民国既建，人人可以为党，于是此伏彼起趋之若鹜。“吾国自改共和政治以来，其所号称政党者总总林林，相此而立；然考其党纲，询其实义率皆漠然未能明了”^②。表现出一种初期实行政党政治的茫然。这时期的政党之争表现为强烈的意志之争，“大率以一党权力为前提，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甲党之所是，乙党必以为非；乙党之所非，甲党必以为是。”^③如共和党骂同盟会大言欺人，负功骄恣，同盟会骂共和党亡国大夫，保皇余孽。

面对西方政党制度的传入和中国政党政治的开展，国人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就反对意见来说，就有无党论、不党论、反党论、毁党论等说。无党论坚持中国传统政治的“用人唯才”学说，反对政党政治，袁世凯即为其代表。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了解很有限，他的政治经验和阅历依旧是旧时代的，他主张“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还曾准备发起救国社，网罗各党的重要人才共同商讨国家大事^④。不党论主张在纷杂的政党争斗中立于旁观地位，以监督各党，“不党之利，以其不自厕身于一党之中，是以能保持公正之地位，任何党之政纲与其党略，皆得而批评之”^⑤。他们“以超然为美名，以党为大恶，相戒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第209～210页。

邵元冲：《政党泛论》，《国民月刊》1卷1号，1913年。

《国事维持会宣言书》，《独立周报》1913年7号。

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

^⑤ 《独立周报》第1期，1912年9月22日。

^⑥ 洗心：《论不党》，《独立周报》第3期，1912年10月6日。

以勿争党见为爱国”^①。反党论主张“国基初定，不宜树党”^②。反对在中国移植政党制度，其主要论据是国民的政治道德及教育程度不足^③。毁党论是反对移植政党阵营中最为激烈也最为典型的一派，他们将政党视为祸国的罪魁：“夫政党何物也？质言之，直可谓为一种垄断国家权力之公司或总会云尔。其商标则所谓国利民福也，其基本金则直接或间接搜括而得之民脂民膏也，其奔走依附之人，则各欲齧割国家权力之一分而栖息其中以自养也。故自党之一怪物呱呱坠地于吾国，而吾国政界遂以多事。一年以来，国事纷扰，政争剧烈。吾民昔昔震恐，恒无守处之曰，盖无所而非政党之为祟也。……苟为救国计，非毁尽一切之政党，而本吾真正纯法之民意以为治，未有能济者”^④。

赞成中国移植政党制度阵营也有多种不同意见，大约有改良派、毁党造党派、调和息争派和反调和派。

改良派有不少旨在于补救政党政治弊端的种种政治主张，他们的改良，主要包括改良人格与党格，例如，在改良人格方面，有康有为主张的输进通职，崇奖道德^⑤。孙中山认为党员要注意党纲、党德、党纪，并提出“党势之盛衰全视党员智能道德之高下。”在改良党格方面，有人提出改良政党有四条办法：政策宜确定，道德宜提倡，私心宜排除，手段宜光明^⑥。这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第209页。

《国基初定不宜树党》，《独立周报》第1期。

吴贯因：《政党政治与不党政治》，《庸言》1卷1期，1913年5月。

少公：《痛苦中华民国之前途》，《独立周报》1913年18、19号。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08页。

⑥ 洪北平：《政党救国之希望》，《独立周报》1913年21号。